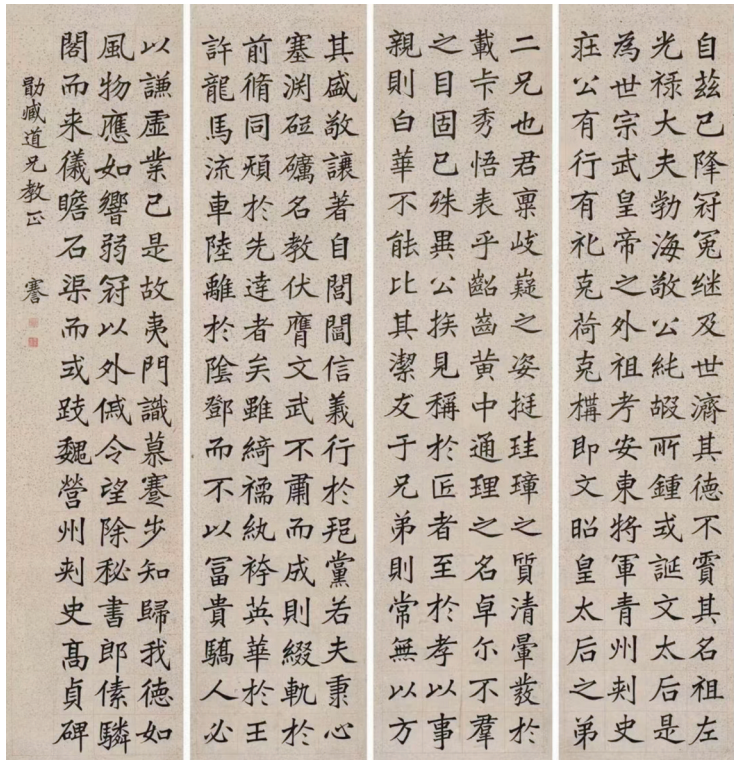




张謇与王世襄家族交往的实证

◎赵鹏

最近结束的王世襄先生的书画工艺品收藏拍卖专场中出现了张謇为王世襄祖父王仁东、母亲金章写的四屏条与对联,揭开了张謇与王世襄家族交往的一角。



张謇为王仁东写的四屏条



张謇为金章写的对联

刚结束的中国嘉德2023春季拍卖会“俚松居守珍”专场,拍品是王世襄先生的书画工艺品收藏,这批藏品中有两件张謇的书法作品,最为我所注意。这两件作品均系王氏家传,一件为楷书节临《高贞碑》四屏条,上款作“勛臧道兄教正”,下款仅署一“謇”字,钐“张謇私印”和“季直”两印,就书法和钐印看,应属张謇中年时期所书。屏条卷轴的签条为王世襄的父亲所题,注明“资政公款,癸亥冬继曾重装”,癸亥为1923年,继曾是王世襄的父亲王述勤,这应是他将此重新装裱后题的签。另一件为行书七言对联,联文乃集苏东坡的诗句:“无数天花随麈尾,更看横翠忆蛾眉。”上款“紫君贤世讲”,下款“张謇”,钐印“张謇季直甫印”,以书法风格看,大致作于晚清时期。

按屏条上款的“勛臧”,也即签条所称的资政公,就是王世襄的祖父王仁东,勛臧是他的字号,或也写作旭庄,张謇与他以兄弟相称。对联上款的“紫君”,则是王世襄母亲金章的别号,张謇称其为“贤世讲”,说明是把她当作有世交的小辈看待的。张謇这两件作品都是为王家人而作,所以也可以当作他与王家交游的实物见证。

张謇与王仁东相识得比较早。光绪十一年,三十三岁的张謇北上参加顺天乡试,在京城结识了一帮号称“清流”的名士,并相与成为朋友,这其中就有福建籍的王仁堪、仁东兄弟。王仁堪比张謇大四岁,而王仁东则大一岁,虽说年岁相差不多,可这兄弟俩的“出道”却早,王仁东于光绪二年考中举人,后任内阁中书,成为一个京官。王仁堪更牛,他于光绪三年中了状元,照例成为

翰林院的修撰。

张謇这回的顺天乡试考风甚顺,中了第二名举人,即所谓的“南元”。然而接下去的会试却是连连失利,不过当他每进京赶考时,都与王仁东等有所酬酢。光绪十七年三月三日,张謇日记云:“与可庄讯,寄勛臧书件。”颇疑上说张謇节临《高贞碑》屏条,就是这寄件。有意思的是此年底张謇在日记上曾开列了一个赠送新年贺礼的名单,其中就有“王勛臧(茶腿)”,即赠给王仁东的茶叶和火腿。

光绪十八年的这科春闱,本是张謇最有希望考取的一次,不想阴错阳差,还是名落孙山。张謇为此灰心丧气,准备回乡终老。在离京前夕,他还因王仁东的介绍,向科举同年冯汝桓索要果树苗木,带回家园种植,并有诗说“百年已决为农计,四海常参种树书”,表明他放弃功名的决心。此后则逢王仁东外放,而张謇中状元后又是回乡创兴实业,除了光绪十九年王仁堪卒于苏州任,因吊丧有一相遇外,他们之间则极少过从。直到光绪二十九年王仁东出任通州知州,两人才重续前缘,又有了一次两年多的合作。

王仁东在通州任上有何政绩,目前尚少具体材料,可以知道的是他对张謇事业的支持,如动员姑丈陈宝琛向大生纱厂投资,资助师范生曹文麟赴日留学,以及与张氏兄弟联手发起创办新育婴堂。这些作为就与他的前任汪树堂对张謇刁难使坏形成鲜明对比,宜乎张謇在《南通县图志》的“杂纪”里感慨“通之为州也僻,游人所不易及,宦斯土者亦鲜名彦”,而列举值得一提其名的几位中,就有王仁东。

王仁东来通后,张謇曾陪他游览狼山,还为他补祝五十生辰之寿。张謇有题作《王司直属寿其季父旭庄太守仁东》的诗,附注谓:“旭庄时知通州,逾其五十初度已二年矣。”其诗云:“京国交游辙,江湖浩荡尘。相从再三叹,几阅八千春。何世容栖遁,成翁亦苦辛。诂论凤池夺,差喜虎符新。感慨能求治,聪明道爱人。愿言君子寿,我亦是州民。”既回忆过去之交往,又希望他能为本地多有所作为。

王仁东也曾赠所藏戴熙画的双松图为张謇贺寿,张謇在画上有题云:“贱齿五十,营师范学校寿松堂落成,直王君勛臧来牧吾州,燕于此堂。猥辱盛意,以此为寿。事相附俚,亦佳话也。”由此可见此时两人的私交也甚为相得。

可惜的是,原来亲近的友谊,遇到辛亥革命带来的改朝换代,竟就翻了船。推其原因,一边是张謇审时度势,迎合了潮流,一边是王仁东自甘遗老,在上海做了寓公,各自作了截然不同的抉择。民国五年,赵凤昌的儿子赵叔雍与王仁东的女儿结婚,张謇有联为贺,但却没有和王仁东照面。而两年后王仁东病逝,也未见张謇的挽吊之作,由此说明他们确是分道扬镳了。

至于给王仁东儿媳金章(紫君)书写对联,我觉得可能并不出于王仁东的嘱托,而应是来自金章兄长金城的请求。金城在晚清时曾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廨襄藏委员,与张謇有交往,因为擅于篆刻,曾为张謇治印多方,而张謇也为其印谱题过长诗。金章也擅绘画,由其兄向张謇请求书联,颇合情理,并且与张謇此联字迹的晚清风格能够契合。



红砖红瓦房

◎程太和

早年,红砖红瓦房是乡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现在这种房基本上见不到了,但我老家所在生产队还有一幢,那是一位下插知青建的房子。知青回城后,那房转手了好几个人。

20世纪70年代中期,海安县各公社(现称“乡镇”)都建起了轮窑砖瓦厂。轮窑厂生产的砖瓦都是红砖红瓦。红砖的规格是11.5×5.5×24厘米;红瓦,又称红平瓦、大平瓦、洋瓦,规格约为26×38厘米。

1970年,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会议决定,争取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为了实现这一宏伟任务,要求社队(乡村)大办农机制造修配厂,以及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其他行业,这对社队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成为1958年之后社队工业发展的新起点。海安县审时度势,根据农民的需要,以及自身的资源特点,决定大办乡镇砖瓦厂。1973年,县革会(县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求县属各乡镇场已办砖瓦厂的,要进行技术革新,改进生产工艺、设备,未办的需积极创造条件上马。在县国营砖瓦厂技术人员的帮助下,乡镇砖瓦企业迅速发展。一时间,农机厂、砖瓦厂成为海安县乡镇工业经济的左膀右臂。事实也证明,砖瓦厂的建立,一方面带来了乡镇集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农民建房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70年代中期,农民建设三间红砖红瓦房又需要多少钱呢?根据不少人回忆,只需要一两千元钱。其中,红砖约一万块,每块3分钱,需300元(这是最大的一笔开支);两根水泥中柱20元(中柱两边的大插及壁柱用家中的杂木,无须花钱);9根水泥桁条约90元;木椽约100元;旺砖2400块(每块两片),约120元;红平瓦1200片,每片1毛钱左右,约120元;石灰1吨,约50元;建房人员工资50~80元之间(主要是木、瓦工工资。小工,农民之间互相帮忙,无须开支);招待费用100~120元。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费用,总体费用也就在1000元上下。三间红砖红瓦房建筑面积在65~70平方米之间,总造价1000元,也就是每平方米的造价在15元左右。

可就是每平方米15元造价的房子,一般纯农户也很难建得起,只有家中劳力多的家庭,节省了几年才能建得起三间像样的红砖红瓦房。有俗语说:喝了几年薄糲儿粥,砌了三间大瓦屋。农家建了大瓦屋,亲戚们都来祝贺,那时虽然不时兴说鸽子,但房子竣工时,瓦工头也要说上几句吉利话:新砌华堂喜洋洋,多福多寿喜满堂。喜得爹爹多富贵,喜得奶奶福寿长,喜得相公高官做,喜得姑娘嫁个状元郎。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多数农民把外出挣得的钱首先用在建房上。拆去红瓦房,建起新楼房。从排列式、组合式,到飞檐翘角的古典式、现代气息的西洋式。从此,红瓦房只是梦中常相见!